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七易落脚点

□ 罗庆宏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至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没有打算要作太远的长途跋涉，但在转移途中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先后七次改变落脚点，终于在第八次时选中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初把湘鄂西作为落脚点

1934年春，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广昌失守后，红军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面对国民党军步步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博古、李德一筹莫展。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获得共产国际同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事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第一次选择的落脚点是湘鄂西。当时，“三人团”之所以选择前往湘鄂西落脚，主要原因是：去湘鄂西有红二、六军团接应，并且路途并不十分遥远；湘鄂西位于四省之交，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此前派出的红六军团向湘西探路成功；等等。出发前，向湘鄂西转移的计划是秘密的，只有“三人团”和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就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不知道。当中央红军向湘鄂西转移时，蒋介石集结近20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湘江天险为第四道。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损失惨重。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

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敌军在前方已布好阵势，如果中央红军还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湘鄂西，等于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和贵州黎平会议上两次力陈应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选择落脚点。

在川滇黔数易落脚点

按照黎平会议落脚遵义地区的精神，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黔北多为少数民族，且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相反，川西北人稠物丰，还有红四方面军接应。在遵义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148个团连同黔、川、湘、滇、桂各路军约40万人合围红军，意欲“聚而歼之”。于是，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第三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然而渡江前，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四次选择落脚点。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然而，在敌军优势兵

力面前，红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截的多路敌军，红军接连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5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苦战达4个月之久，都没有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终于迎来一片新天地。此时中央红军也元气大伤。考虑到川陕根据地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且川陕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在四川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五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在懋功期间，中央结合日本侵占华北的新形势，提出放弃会理会议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六次选择落脚点。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集中力量北上。不料，张国焘又出尔反尔，甚至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于是，党中央率部分红军迅速北上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在俄界，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鉴于红军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且此时只有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北上，中央遂第七次选择落脚点：应“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为打通国际关系，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前往新疆建立交通站。

最后把陕北作为落脚点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

又翻越了岷山，当部队即将到达甘南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毛泽东指示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就是把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当时哈达铺虽然是一个小镇，但这里开设了邮局，能收集到一些报纸杂志，这是当时中央红军获知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毛泽东在找来的报纸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此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已经在陕甘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据地也具备相当规模。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到陕北去，说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又一次分析了日本独占华北、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的新形势，认为这些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正式批准把革命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落脚点。

长征途中七易落脚点，既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也是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皖西烈士陵园位于安徽省六安市中心区域九墩塘畔，是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在陵园中央，矗立着烈士纪念塔，塔顶是红色五角星，塔高18米，塔基边宽3.2米，塔身呈方形锥体，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手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其余西、北、东三面刻有记述皖西革命斗争史的碑文，全文如下：

皖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老根据地——鄂豫皖边区的组成部分。远在一九二四年，党就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组织。一九二九年秋，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红军和赤卫军，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当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进入艰苦阶段，皖西人民仍坚持着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皖西又成为新四军、八路军的活动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皖西的游击部队和人民更有力的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皖西人民在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进行着百折不挠地英勇斗争，涌现了大批的革命英雄和群众领袖，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为了纪念革命先烈，本会特将皖西地区在各个革命斗争时期的烈士遗像、遗物和革命文物，搜集一部，陈列于烈士馆内，以供瞻仰与学习，藉以勉励后人，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

兹当烈士塔巍巍矗立之际，谨志数语，以昭忠烈。

皖西烈士纪念馆筹建委员会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十二月

碑文概述了皖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歌颂了皖西人民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光荣事迹和革命精神，缅怀了为革命奉献生命的英雄先烈。敬读碑文，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西党组织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领导皖西人民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早在1923年12月，曹蕴真、薛卓汉、徐梦秋等人在寿县小甸集小学成立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这是安徽省最早的党组织。此后，皖西地区党团组织纷纷建立，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队伍。1929年11月8日，周维吉、吴干才、朱体仁、许希孟等领导独山镇附近15个乡的数千名农民，发起了独山暴动，打响六霍起义第一枪。随后，独山镇附近的西河口、龙龙门、郝家集等地纷纷起义。接着，六安中心县委组织召开三区区委会和区农民协会联席会议，成立六安三区革命委员会，把起义武装编为六安三区游击队，挑选农协会员骨干组建赤卫队。领导独山暴动的吴干才、朱体仁、许希孟等人在郝家集被敌包围，朱体仁当场牺牲，吴干才与许希孟等人不幸被捕后遭敌杀害。六霍地区的一系列起义沉重打击了皖西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起义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成为安徽省境内诞生的第一支主力红军，初步创建了南北200多里、东西100多里的皖西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六安县革命委员会、潜山县革命委员会等县级苏维埃政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至1934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川陕后，皖西人民依旧坚定信仰、艰苦斗争，保卫着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12日，国民党军向霍邱县城发起总攻，红二十五军军长卞继勋率教导团和霍卅独立团3000余人，手持大刀与敌展开巷战，卞继勋身负重伤，4名警卫员牺牲，守城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员在

写下无数壮烈事迹的皖西热土

——皖西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盛永胜

西城墙下的埋蛇沟，手挽手组成人墙以抵挡敌人机枪扫射，掩护后排同志撤退，其情景壮烈、可歌可泣。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带领皖西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日烽火燃遍皖西。1938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高敬亭在七里坪，将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计3100余人。4月至5月，第四支队进驻舒城东西港分区，建立了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巢县蒋家河、六安椿树岗等地伏击日军，并于安合、六合公路等沿线抗击日军，参加战斗90余次，毙伤敌2300多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多人，缴获枪支1400多支、军马20多匹，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斗志。

第四支队进入皖东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后来的华中局根据党中央指示，调配力量在皖西建立了大别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寿东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寿六合霍抗日游击区。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进而开展反革命“清剿”，围堵共产党人的抗日武装活动。在反顽作战中，安巢山党支部书记沈谋正等一批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

解放战争时期，皖西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斗争，踊跃支前。1946年1月，华中四地委和军分区负责人黄岩等在定远县老人仓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寿六合霍游击大队，深入皖西地区开展游击战。6月，华中四分区定滁全县支队独立营200余人，突围到皖西大别山区，在合肥、巢县、和县、含山一带开展革命斗争。在皖西游击区的斗争中，不少党员、战士、群众为革命献出生命。1946年冬，国民党军在“进剿”寿东南时，抓捕了61岁的共产党员曹少修，对其刑讯逼供，利诱其劝儿子曹云鹤投降，并捆绑其游遍吴山庙、杨家庙、瓦埠镇、下塘集等10余个集镇，曹少修始终不屈服，最后英勇牺牲。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陈锡联率第三纵队在皖西作战，皖西人民积极支援前线。中共岳北县委和皖西支队组织1500多名群众，带着300多副担架和80只毛排，帮助大军抬运伤病员，为部队筹措了300多石粮食。在部队转移到舒城县晓天地区时，当地群众捐送大米100多石、军鞋2000余双。

1949年1月21日，皖西军区三分区基干一团解放安岳县城，1月21日解放六安，皖西区委、行署、军区和皖西三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机关移驻六安城，从此，古城六安成为皖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导中心。1949年9月6日，金寨县金寨寨解放，标志着皖西全境解放。

中央苏区时期的水利工作

□ 杨凯强 马晓敏

90年前，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首次将水利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为我们党治水兴水提供了长期遵循。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在兴修水利、防治水害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展苏区经济、保障军民生活、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设立专责机构，强化水利职能。中央苏区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专门成立山林水利局，作为统筹苏区山林水利工作的领导机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包括土地人民委员部在内的“九部一局”（后又增设国民经济部和粮食部），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四梁八柱”。山林水利局隶属土地人民委员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负责水利建设事业的机构，内设水利、山林、总务三个科室，主要职能包括“管理坡圳、河堤、池塘的修筑与开发，水车的修理和添置，山林的种植、培育、保护与开垦等”。地方水利组织管理机构主要为山林水利科和水利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苏维埃政权制度，乡（市）苏维埃为基层政权组织。省县市区各级土地部之下均设山林水利科，其职责与山林水利局类似，主要负责地方水利设施的修筑与开发、修理与添置。在市区、区属市和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还设有水利委员会，其职责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城内市区，管理街边及房屋下阴沟之修理，附

城河堤修筑，城内外池塘水井之疏浚。在城外市区，管理坡圳、河堤、池塘之修理与开筑，水车之修理与设备。”此外，各村还自发组织成立了管水队、水利修建队等。中央苏区各种经常性、临时性的水利建管组织设置，联结构建了责权分明、协调有序的水利组织体系，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

注重建章立制，规范水利治理。中央苏区早期的水利立法与土地立法紧密相关，旨在提高山林水利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十条规定：“一切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实际上明确了水利的所有权性质，将土地和水利等国有机化。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怎样分配水利》《山林保护条例》《为发展水利》等法律和条例。为保障贫农、雇农和中农的合法权益，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对苏区范围内的耕田、山林和水面，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登记发证。为合理分配山林水利资源，各地方苏区政府颁布了大量明确各地生态资源所有权的法规，如1931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了《山林水塘的分配》。1932年7月，闽北分区工农民主政府颁布《改良水利宣传大纲》，提出“要在八月内把各地所应修复建筑的堤坝，弯、圳、塘等做得很好”。为保证效果，事后苏维埃政府还派员前往现场督促和实地勘察，对未按时完成的予以处罚，确保水利建设工

作执行到位。通过一系列法令的颁布，奠定了苏区管水治水的基础，也为农民群众用水兴水提供了依据。

破除封建迷信，引领科学治水。当地群众深受风水术、巫术等封建迷信的浸染欺骗，在水旱灾害发生时，各种祭祀活动频现，祈求龙王降雨驱旱魔、息怒止淫雨。此外，百姓还普遍认为挖山动土、疏川截流会影响人丁和财运。苏区时期，党领导苏区军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文化运动，推动了苏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破除了封建神权和姓氏宗族的束缚，为苏区水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苏维埃政府逐步引导群众以科学的态度开展水利建设，1932年6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区县土地部长联席会议作出决议：“要在最便利容易得水的灌溉的地方作破圳，不能以风水迷信去阻碍作破开圳。”1932年，瑞金合龙、白露两乡的农民本想修水渠抗旱排涝，但当地的地主豪绅却以“修水渠会破坏风水”为由煽动群众抵制。山林水利局闻讯后指派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并召集两乡的群众开会讨论，并最终冲破封建迷信的阻挠，严惩不法分子，成功修建了水渠。1933年9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看到群众饮水困难，决定破除迷信，带领红军战士和群众在村里挖了一口水井，解决了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广大军民开渠筑坝、打井抗旱清淤疏浚，苏区水利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1934年9月，陆定一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的《两个政权——两个收

成》中写道：“水利方面，特别是今年得到了极其巨大的成绩，旧的陂圳池塘已经几乎全部修好，新的也造了不少，都是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因迷信风水而不准开发的。”

组织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党在中央苏区水利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通过书写标语、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苏区群众的积极性。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以革命竞赛的方式发动全员参与兴修水利”。1933年4月，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在发布的《夏耕运动大纲》中发出“人人关心水利建设”“破除池塘赶快修好”的号召，要求各县、各区动员组织人力投入“水利的开发”。1934年3月，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颁布《为发展水利》训令，要求各地“立即动员群众，开发水利，以克服水旱灾荒”。为推动苏区农业生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创造性地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社，农民可以在农事生产上互帮互助，利用农闲时间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同时，广泛开展农业生产竞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新建和修复了许多陂圳、河堤、水塘和水车等水利设施。如瑞金武阳区松山乡水利委员会积极组织群众自带伙食开塘，仅用3天时间，就开好一口储水面积足够灌溉附近产量2000余担田的新塘。毛泽东称赞这些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